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创新^{*}

杨 扬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创新主要在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政党外交原则的理论发展;对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进行区分,并对政党外交进行合理定位。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的实践中,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外交对象的广泛性;外交内容的丰富性。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共同推动政党外交事业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政党外交 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作者杨扬,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 400715)。

在总结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政党外交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立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断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开展对世界各国政党的外交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升华与创新政党外交的基本理论,并指导中共政党外交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立体化的政党外交新格局。

一、中共政党外交的理论创新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经历了重大转折和推陈出新。尤其是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调整政党外交的基本思路,解放思想,突破陈规,不断开拓理论创新工作,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中共政党外交实践进程中,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这种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超越意识形态,妥善处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问题

意识形态是政党产生的理论基础,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前提。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其政治立场、信仰使命、价值观等政治本质。政党意识形态与其对外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政党的对外政策大多体现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在政党对外工作中的具体化。政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党对外政策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二者在发展过程中便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工作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意识形态划线成为我党处理政党外交的基本准则和党际关系亲疏与否的分界线。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中苏政党外交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合作局面;20世纪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中苏对马列主义的解释存在差异,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13YJC810021),中国博士后第53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2013M531918)、中国博士后第七批特别资助项目《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2014T70840)的研究成果。

苏共往往被我党谴责为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在与我党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政党交往中，我们则采取几乎是关门主义政策。这种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和价值的政党外交，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工作遭受了重大挫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意识形态在政党外交中的作用，并逐渐实现政党外交的理论创新。尤其是今天的世界，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政党外交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内与国际政治的走向。作为世界上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有效开展与世界各种类型政党的外交工作，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解决政党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的矛盾，使政党摆脱意识形态困境，最根本的是在保持意识形态不变的前提下，努力调和这种矛盾，从新的角度寻找政党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寻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实现了真正的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如何与同质性或异质性意识形态的政党交往，我党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方针。邓小平主张“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①，“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②，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政党外交过程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超越意识形态”不是说放弃，而是承认政党外交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承认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承认尊重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彼此对意识形态的自主选择。“超越意识形态”并不是意味在政党外交领域已不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在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分界、对立和斗争仍然存在，只是以新的形态和方式表现出来，要把这种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能超越二者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大局。“超越”意识形态，即不强调彼此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同时又不同化对方

的意识形态选择。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是存在的，但我们决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对抗，不强加于人，不接受他党的意识形态。从本质来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最根本的是搁置彼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求同存异，寻求彼此的共生性利益，谋求相互之间的合作和利益互惠，达到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外交中意识形态的处理，是基于过去政党外交发展史的经验教训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理论认知的重大创新，并把这一理论发展上升为中共政党外交的基本原则，强调政党外交要突破意识形态的纷争与矛盾，而把落脚点归宿到政党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政党外交中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尤其是与异质性政党的外交中，妥善解决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为寻求彼此合作与共同发展找到了利益契合点，推动了政党外交的蓬勃发展。这一理论创新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生命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解决了与不同性质政党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存在的矛盾，使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工作中游刃有余。

（二）政党外交原则的理论发展

从政党外交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政党外交过程中需要遵循基本原则。作为政党外交的主体，一国政党在同其他政党交往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这主要体现在党际关系问题上，各国政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正常的党际关系，尤其是今天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加深；各国独立自主的倾向度加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政党外交的基本原则。诸如独立自主，相互平等，决不允许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等，这些原则在政党外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对分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

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之上，总结国际共运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党际交往思想，创立了新型党际关系的理论，用来指导政党外交实践的发展。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中共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并将上述思想原则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这四项原则便成为政党外交的基本原则。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上述党际关系四项原则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工作的理论基础，为中共处理同各国政党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南。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党在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对外交往行为准则系统化，理论化，形成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用来指导政党外交的实践，并成为政党外交的基本原则。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是一个密切的有机整体，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各国党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自主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力；各国党有权独立管理和决定党内一切事务，自主制定本国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82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本国的共产党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的同志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肯定会犯错误。”^③“完全平等”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各国党无论大小强弱，年轻或历史悠久，执政、参政或在野、都是平等的。各国党之间不是父子党，不是上下级关系，不能以大欺小，以老压新，不能对其他政党发号

施令，不能把自身的观点、理论和主张强加于他党。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的教训时指出“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④这表明，要创造良好的党际关系，完全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互相尊重”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各国党的情况存在差异，每个党都有自身的优势与不足，经验与教训，成就与失误，在政党外交的过程中要尊重他国政党的基本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求同存异，密切合作，促进政党外交的发展。“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⑤“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一国党对别国党发号施令和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只会使该国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任何政党在政党外交中不应该利用党际关系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不应干涉他党的内部事务。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政党外交原则。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政治报告中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开展交流与合作。在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不破哲三谈话时，他指出，“各国共产党人可以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探索，不存在‘中心’，不能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不要对别人的探索和实践指手画脚，更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和模式强加于人。”^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也非常重视政党外交工作，主张按照党际关系四原则继续深化同世界各国政党的友好合作关系。胡锦涛强调，各国政党之间应当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也不应介入别国和干涉别国内部各

个政党之间的事务，更不应利用党际交往干涉别国的内政，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他在会见社会党国际客人时指出，中共重视同各类政党发展良好关系，愿加强对话，增进了解，扩大合作，为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不懈努力。^⑦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对外工作 90 年暨中联部建部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党的对外工作“必须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诚心诚意同各国政党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关系和人民友谊的党际关系，推动同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⑧习近平同志强调政党外交原则要服务于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以党的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三）有效区分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并对政党外交进行合理定位

政党与作为主权国家载体的政府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主体，都具有对外职能。当一国政党上升为执政党时，其对外职能和政府的对外职能具有同向性，即党的外交与政府外交在根本方向上具有一致性，但二者在具体的对外职能分工上存在差异。改革开放以前，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并没有合理区分，二者的糅合与混淆，以党的意志代替了政府和国家意志，严重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以中苏政党外交为例，当中苏两党关系融洽时，中苏两国关系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当两党关系表现出矛盾和冲突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演变为对抗和双边关系的破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政党外交凌驾于政府外交之上，不利于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外交工作进行了清晰的定位。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国际共运中曾出现的党际关系不和谐给国家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强调

指出把党同党的关系和国家之间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外交和以政府为载体的国家外交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把政党外交和政府外交区分开来，摆正二者的位置，使政党外交服从于国家总体外交的目标，发展政党外交是为了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从主体性来说，政党外交体现的是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了各国间阶级利益或阶层利益的合作或矛盾。政府外交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主权、安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更多反映了综合性的国家利益。把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区分开来，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使政党外交凌驾于政府外交之上，而是使政党外交配合政府外交的发展，使政党外交服务于促进国家关系友好发展的目标，解决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错位的问题。

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是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论断把政党外交提高到同我们党的事业紧密相连的新高度。政党外交是对政府外交的一种配合、补充、甚至是引领，共同推动国家总体外交的发展。因此必须将政党外交置于国家关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中考虑，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准则。习近平在纪念党的对外工作 90 年暨中联部建部 60 周年大会上指出，要“紧密结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推进党的对外工作，自觉地把党的对外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认识，放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来谋划，处理好内政和外交的辩证关系”。^⑨把中国共产党外交定位为党的事业的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共政党外交在国家发展中的清晰定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政党外交定位为党的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

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外交是党的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这反映了政党外交与党的事业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外交的清晰定位，解决了政党外交在我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重大理论突破。

二、中共政党外交的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扭转政党外交的不利局面，拓展中共政党外交的实践，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其主要表现是：

（一）政党外交对象的广泛性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对象主要局限于同质型政党，主要是共产党与工人党、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左翼政党，中共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政党几乎处于一种隔绝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对象不断拓展，逐渐广泛，从最初的只同共产党与工人党交往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与政治组织开展外交活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至此，中共在政党外交中，不再区分“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而广泛地表述为“各国政党”。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共“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

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与合作”。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中共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从历届党代会报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对象逐渐扩大，其广泛性非常突出，不仅包括共产党与工人党，也涵盖世界各国不同性质的各类型政党，左翼的，右翼的，只要它们愿意与我们交往，都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对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敢于承认自身在20世纪60年代所犯的错误，努力修复、恢复与诸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1980年4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党高度赞赏我们两党恢复关系。过去吵架没关系，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①1989年5月，邓小平在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指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我们也宣布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与法共、意共、苏共、西班牙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等多国共产党的外交关系。

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外交关系，就和平与发展问题、国际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等开展协商、交流、沟通与合作。中国共产党开展与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意志自由民主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统一社会党、日本公明党、自民党、社会党，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墨西哥统一

社会党等各政党的外交活动，促进了双边关系的交流，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对象向纵深方向发展，主要体现为向政党国际会议、高层论坛机制化发展。自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连续六次参与或主办亚洲政党国际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宣言，促进了亚洲国家各政党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增进亚洲国家的相互理解与信任，通过政党的独特作用和渠道推动亚洲地区合作。自2010年以来的中欧政党高层论坛至今已召开四次，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促进合作”的对话原则，为中欧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2008年8月，中共首次派代表参加美国民主党党代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美国民主党党代会派出观察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增强与国际交流的愿望，中国应该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3月以来，中美连续举行五届政党高层对话，形成了政党外交的机制化渠道，进行了深入、开放、坦诚的对话，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合作，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中美政党外交的深入开展与机制化对话的建立，打开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长期以来的相对关门主义状态，加强了彼此的交流与合作。

（二）中共政党外交内容的丰富性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共产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与国际主义援助、推进世界革命等政治性问题。拘囿于时代发展的特征，其外交内容相对比较狭窄而单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外交内容变得日益丰富。传统的政治领域一直是中共政党外交

的重要内容。中共在与其他国家政党交往中，围绕着国际形势、和平与发展、双边关系、全球性问题等议题展开交流、协商，推动政治对话与合作。

政党外交的中心议题由政治领域逐渐转向经济领域的发展问题。经济因素已经成为中共政党外交的核心议题。政党外交的主要内容在于“经济外交”，强调以经济建设与发展为要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为全国各地区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合作搭建良好平台，成为二者的“中介人”，发挥牵线搭桥的重要作用。在政党外交中，通过双方经贸合作，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政党外交中注入经济因素，使其更具有活力与生命力。通过中联部的联络平台，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通过实地走访与考察，了解外国市场的供需情况；积极参加各种经贸领域的展会活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企业实力与成果，推动更大规模的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共政党外交已不满足于一般性的交往，更加注重交往的实质性内容，特别关注经济的发展。在政党外交中，中国共产党将促进经贸合作、地方经济发展，为有关省市和经济部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一些省市领导随中共代表团出访他国，通过政党交流与合作，为经贸合作牵线搭桥，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成就。在组织地方党委领导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访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安排经贸活动，有效促进了地区重点经济领域的合作。在政党外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他国政党探讨发展经济，引进和利用外资、治理通货膨胀、大中型企业改革，交流社会保障制度、环境保护、就业培训等民生问题。政党外交注入经济因素的第二重含义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外部世界政党的交流互动，开展经济领域的对话活动，展开经济调研活动，为国家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建言献策，

提供智力支持等。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中积极传播自身的对外政策，交流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政党外交的平台，用外国政党听得清、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宣传中共党代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积极宣扬自身的和平对外政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理念，为党和国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声威。当今世界各国各类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党建、治国理政方面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活动更注重研究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重视总结外国各类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主动介绍一些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同国外政党就政党政治的基本理论、执政能力、执政规律、执政方式等开展交流与合作，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执政党的旺盛生命力，树立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民主、进步、开放、创新的良好国际形象。

新时期中国共产 党外交非常注重做“人”的工作，这是政党外交的重要内容。政治家 是政党政治的主要行为载体。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外国政党政治人物不断接触，广交新朋友，深交好朋友，不忘老朋友。外国政党领导人既有执政党领导，也有在野党党魁；既有老政治家，也有青年政治领袖；既有建交国的领导人，也有未建交国的政党精英。中国共产党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沟通，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并使他们成为知华友华甚至亲华的重要政治力量。

三、余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 党外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不断创新，取得了重大成绩，加深了政党之间的合作与友谊，推动了国际

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善治。中国共产 党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互交织，相互联系，共同推动政党外交的发展。也正是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国共产 党外交的发展势头将更为迅猛，其交往对象的数量将日趋增加，外交内涵将更为丰富。据统计，“文革”时期，当时世界上 89 个共产党与工人党中有 78 个先后与我们党中断了关系，使我党陷于自我封闭与自我孤立的状态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调整与创新。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们党已与 110 多个国家的 270 多个政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交往，党的对外工作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2007 年，我党与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个政党、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交往和联系。2011 年，同我们党有交往的政党已经遍及世界各国，总数达 160 多个国家的 600 多个政党，交往范围从国际到国内、从经济到社会涉及各个领域，中国共产 党外交新型格局已形成并逐渐走向成熟。

注释：

①②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0、353、236 页。

③④⑩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63-864、1275、1275 页。

⑥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4 页。

⑦ 田永祥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4 页。

⑧⑨ 徐京跃 《党的对外工作要继续往开来再创辉煌》，《人民日报》2011 年 1 月 18 日。

⑩ 《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22 页。

[责任编辑：王道勇]